

左

稻奋年谱 1895

上卷

右

邹嘉骊 编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K825.42
ZTF

韬奋年谱

上
卷

1895—1932

韬奋基金会 韬奋著作编辑部
邹嘉骊 编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邹韬奋
1895—1944



1908 年时的韬奋



1921 年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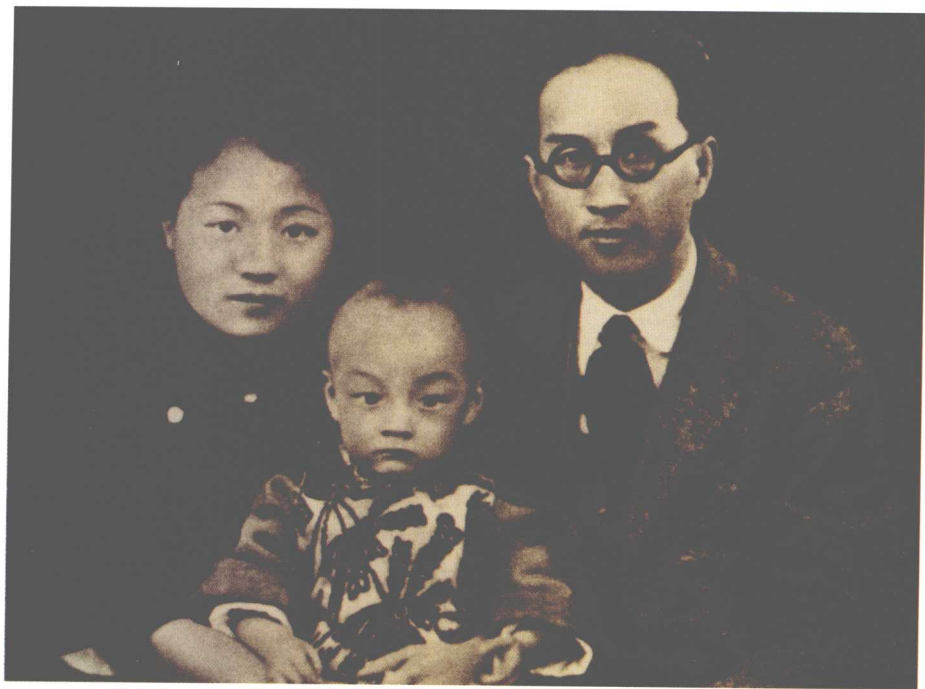
1924 年韬奋在上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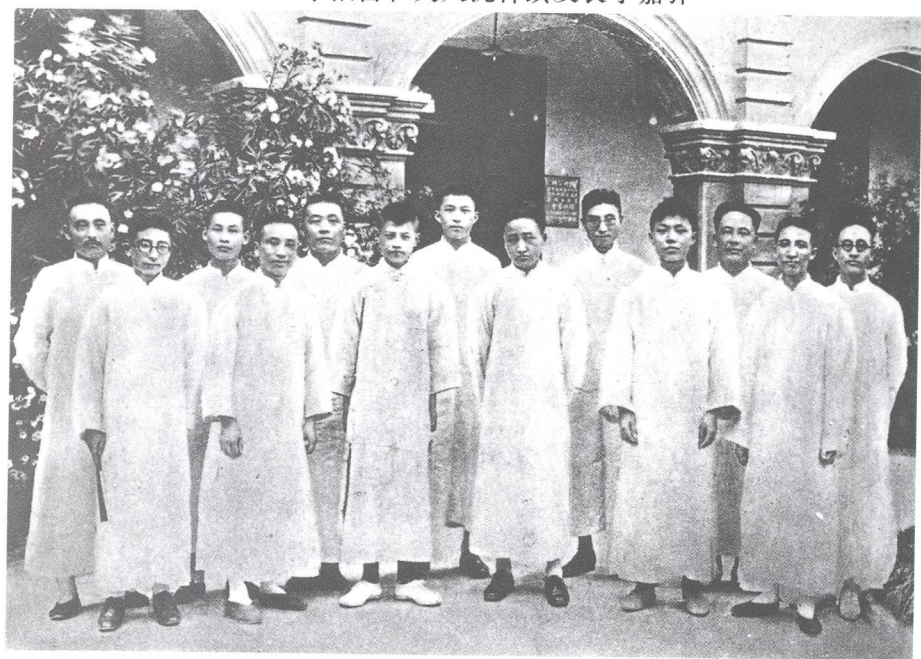
韬奋和夫人沈粹缜（1926年）



1926年10月韬奋接编《生活》周刊



1928 年稻奋和夫人沈粹缜及长子嘉骅



1928 年稻奋（右一）与黄炎培（左一）等合影

邵福香年譜

邵志華

大家力量充實
已的力量，就是充實
國庫的力量

沈雲之

轉交沈九若
時在南昌

编 者 的 话

邹嘉骊

多年来,沉浸在编撰《韬奋年谱》的工作中。我做了近三十年的文艺编辑,从来没有编过年谱,太陌生了。年谱怎么编?心里一点数都没有。为了需要,参阅过多本已经出版的年谱,只是参阅,无法照搬。停下不干吗?心愿要落空,二十多年积累的大量资料随着岁月埋没,成为一堆没有生命的物体,太对不起它了。父亲临终前,用颤抖的手写下的“不要怕”三个字在我脑中显现。当年,是激励我们不要怕民族敌人、黑暗势力、反动派,现在是激励我们不要怕困难,不要怕挫折,实践会教会我们真知。经过几年努力,对于如何制作年谱有点体会了。

首先,最重要的,是要建立丰富的资料库。这项工作,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辑录《韬奋著译系年目录》开始,就着手了。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。几十年来,书籍报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,已经出版的有关年谱,都是我编撰《韬奋年谱》的资料源。1995年出版的《韬奋全集》,更为编撰年谱提供了丰富的史料。韬奋一生没有记过日记,要编排出他的一生,只有凭借丰富的资料为依据,点点滴滴,辨别真伪,去芜存菁,整理、编写,排列出比较系统的材料,最大限度地为后人提供一份可靠的记录,让韬奋思想发展的脉络,由此而清晰、具体、生动、形象起来。

资料,有的已成书,只要认真阅读,选出有关内容,编成条目,输入框架;有的却是一团乱麻,需要一丝一丝梳理,去芜存菁,去伪存真,再编成条目,输入框架;有的事实细节不清,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对,弄清楚了再输入框架;有的有信息,查不到原始出处,只能存缺。总之,这是一项细致琐碎的工作,需要较长的时间、耐力,踏实的作风,平和的心态,真像蚂蚁啃骨头,一点一点搬运筑巢似的,做成了,其乐无穷。浮躁,急功近利,恐怕很难做成。

《韬奋年谱》包括四部分要素:1. 活动;2. 篇目;3. 文章摘要;4. 相关的

人和事。

活动。取之于大量的文字资料。各篇文章中,有明确的时间、地点、活动内容,都专门摘出,编成条目,循编年次序排列。没有注明的,根据所提到的人或事,作出比较客观的推断。

篇目。比较好操作。前有《韬奋著译系年目录》作依据,后有《韬奋全集》作补充,再者,全集出版后又有新的发现。三部分整理归拢,组成现在的样子,就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篇目。

文章摘要。摘什么,怎么摘,这是很费神思的。

在阅读大量文字稿的过程中,我不断地受到感动,不断地激起心灵的震撼。原作者们很多是父亲的同辈人,是我的前辈,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得到过他们无私的关爱和照顾。他们在我眼前活动起来。他们的战斗经历,他们的高风亮节,他们的道德风范,他们的崇高人格,都应该流传后世。编活他们的生动形象,是这本年谱应该努力做到的。

习惯的做法是编者在前台,用他的文字来复述原作者的意思,来介绍原作者。这样做,文字是简炼了,但是生动的事实,鲜活的时代风貌,活跃的战斗氛围,变成了枯燥乏味的几条杠杠,阅读兴趣大打折扣。寓教于乐,变成了有教无乐。书编出来谁看?没有人看,束之高阁,岂不浪费人力、物力、财力?虚度年华,多可惜。再有,编者在前台,他是主体,他有莫大的解释权,他可以对原著作精辟深刻正确的解释,引导读者去了解原作者,认识了解当年那个时代的历史;也存在另一种可能,在复述原作者文章的时候,有意无意地用现代人的心态,现代人的语言,掺合进解释词中,曲解原作者的意思。原作者已是故人,他哪里有为自已辩解的余地?这是一种误导式的操作。以讹传讹,时间长了,甚至几代人的努力,都难以纠正。那是一种过失。

我尝试着把历史人物推到前台,尽量引用原作者的原文,保留当年各种人或事件发生时的原始状态,保留原作者的风采,让他们在前台,用他们自己的语言,向读者讲述当年的故事。这样操作,我的第一感觉,是条目增加了信息量。各种人物在舞台上,不是身后有牵线人,而是举手投足,他们自己活跃起来,是有生命的形象。不是死板的,是活泼的,不是枯燥的,是形象的,就有了吸引力,读者就会有阅读兴趣。我的主观愿望是把这本年谱编得让青年读者有兴趣读,而且能读得下去。

我的信心建立在原作者精辟的叙述中。比如韬奋,他的文章大众化,口语化,文笔浅显、犀利、幽默、生动,有很大的鼓动性,当今的青年至少能够读

懂,容易理解和接受。又比如茅盾,他叙事条理清晰,时间、地点、明明白白,可贵的是他公正宽容的态度,令人信服。对当今文坛树立良好风气,不失为的一面镜子。于伶回忆东江纵队秘密营救韬奋和一大批文化精英的文章,更是一篇绝好而详尽的补白。萨空了的《香港沦陷日记》,增加条目不多,但是他亲身经历,第一手材料,真实可信,是不可多得的一份补白。我感谢他送我这本书。我的标准,凡是为年谱增加一条信息,经查实,确有价值,我会一直铭记在心。1999年10月20日,我和刘仁寿老人在路上相遇,他知道我在编年谱,立即提供一条信息,说1936年,国民党中央委员、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化名黄毅,按照潘汉年给陈果夫信上约定的联络方法,在韬奋主编的《生活日报》上刊登启事。通过登报启事和潘汉年取得了联系。我回到单位,即刻翻出《生活日报》,一页一页寻找,在7月7日第二版的中缝,找到了这则启事。一个未确定的信息,变成了一条根据可靠,事实清楚的条目。我也许说得过份,真是高兴得心花怒放。还有……

年谱中一个压台的“史料”,是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等领导人,对进步文化事业和一批文化精英(包括韬奋在内)的具体指导和关爱,不单是个人的魅力,而且是以党的文件、电报体现出来。

我希望做到这本书里的历史人物,不是一张平面的黑白照片,单薄而苍白,而是鲜活的、立体的,以他真实丰富的音容笑貌,激情满怀地走近我们,和我们一起走向未来。

相关的人和事。有些资料因为难得,查找艰难,比较珍贵,为了不让它流失,就在本年谱里“存照”了。

我闭门造车造出这点体会。为了做年谱,多少年,我几乎就生活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。新的两点一线。这点体会,对于行家,或许认为是老生常谈,没有新鲜感,对于我却是难得的一笔宝贵财富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样操作,行家们能否认可,读者们能否接受。热诚期盼听取各方的指点。

年谱按编年循序排列,共分三个板块。

第一板块:1895—1932年。包括韬奋的出生地,大家庭,童年,苦读生涯,初出茅庐,走上新闻出版之路。这时期,他事业初创,默默奋斗,还没有上舆论界的知名榜。他的名字和声望,是在风起云涌的抗日烽火中出现的。本版块,重点在编摘篇目和摘要。活动,多数从全集的文章里摘录出来,编成单独的条目,列在里面。本板块的特点,为研究韬奋的早期思想,提供了

一份编年式的摘录和摘要。他的思想脉络是具体的,感性的,是能切身感受到的。

第二板块:1933—1937年。被迫流亡,寻找出路,站在抗日救亡的前沿,以笔为武器,高举抗日大旗,唤起民众的觉醒,为抵御反抗日本国的疯狂侵略摇旗呐喊,虽坐监(“七君子”事件)流亡,决不屈于强暴,绝不改变主张,带领他的一支小小的队伍,汇入抗日的洪流中,一往无前。

第三板块:1938—1944年。配合共产党,在国统区,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投降、倒退、分裂作不懈的斗争,讲究策略,有理、有利、有节,仍遭到忌恨,迫害,数十处生活书店分支店被查封,愤而出走重庆,到香港另辟战场,太平洋战争爆发,东江纵队营救,隐居广东梅县江头村,遭国民党通缉,秘密护送至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,病重,改名换姓,返回上海,环境险恶,轮番转换医院,诊治顽疾,终因不治,病逝。贯穿其间的是一条鲜红的红绸带。正如1942年11月,他回答大众书店的一位同志时说:“从武汉到重庆,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,其后,回到上海,转到解放区,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,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。”

本板块的特点。此期间,韬奋已是“社会名流”,受到多方关注,对于他的活动,他的文章,都有一定的文字记载。挖掘当年的文字资料,搜集,整理,摘录,编写,就成了有价值的“活的史料”。“活的史料”多,是本板块的特点。可读性较前两个板块强。

这部书稿,最初由三位同志参与:邹嘉骊、陈挥、陈理达。按板块分工。

陈理达按约定要求,完成了第三板块的篇目输入,承担一定的组织联络工作,之后,因为主业,负责中国韬奋基金会上海常设机构的管理和业务工作,实在无法脱身,只得放弃,后续工作就由我来做了。

陈挥负责第二板块。用了不少工夫,编写出初稿,我们多次交换意见,他也修改过两遍。要年轻人迁就老年人的思路,很困难。他也是兼职的,也有主业和兼职的矛盾。不得已,现在第二板块也由我重新操作。对于他付出的辛勤劳动,应该给予肯定。

我原本两个任务:一,负责第一板块;二三个板块做好后,我来统稿。现状不可能做到了,只得“一肩挑”。好在韬奋基金会给我配了一个助手,第二、第三板块的原文摘要,只需我用铅笔划出,她都能电脑输入,如期完成。她叫郭以欣。

再丰富的资料,总是有局限的,有些交叉回忆的细节,因年时太长,难以核对,只能取大事件存真,有的“并蓄”,有的舍去。

编写这类图书,难免有疏漏和失误,衷心地期待行家们给我提出宝贵意见,更重要的是对事实的补充和纠正。引用的资料,我明白注明出处,以示尊重原作者,尊重原作者的劳动成果。

为阅读便利,我在每个条目的前面做一个符号,属活动性质的,注一个○,属篇目和摘要的,注一个⊙。

我是在中国韬奋基金会这个团队里制作这本年谱的,队里的青年同志们,在我困难的时候给我支持,在我苦闷烦恼的时候给我欢乐,使我在寂寞的工作中不感到孤单。谢谢他们。

《新文学史料》编辑部,答应在未成书前选登一部分,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。所以这样说,是我做了那么多年,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,且学且做,且做且学,是否想在点子上,是否做在点子上,心里并没有十分把握。唯一自我肯定的一点,是一定在资料库里游走,一定要做到言之有据,绝不闭着眼睛胡编瞎造。要对历史负责,对读者负责。这样的编排是否合适,是否合理,有多大利弊,有什么更好的建议,期待行家们的指导。

2003年12月5日

快乐的追踪——付印前的几句话

邹嘉骊

满心愉悦,我竟又能面对电脑荧屏,点击鼠标,像一个个音符点击在五线谱上,演奏出悦耳的乐曲。“又能面对”,是因为几乎“不能面对”。是的,今年年初,我生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急病,惊吓了太多亲人和朋友,几乎“不能面对”。坏事变好事,惊动太多,反而调动了自己的、亲人的、医务的等多方面的积极因素,终于安然度过险情,转危为安了。于是就有了“又能面对”,自然是“满心愉悦”。

回到荧屏前,想想多年耕耘的《韬奋年谱》终于可以付印了,许多感人的事,许多感人的情涌上心头。

去年,《新文学史料》选登部分“年谱”时,我写了一篇《编者的话》,说到制作年谱最重要的“是要建立丰富的资料库”。如何丰富资料库?实践告诉我:一是要随时搜集,做到长期积累;一是不轻易放弃。

“年谱”中输入不少未收进《韬奋全集》的文章和史料。比如,一九三六年,日本当局如何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,充当幕后黑手,相互勾结,共同制造震惊中外的“七君子”事件,压制抗日救亡运动;为营救“七君子”,宋庆龄如何致函冯玉祥,冯玉祥又如何致电蒋介石来往密电等。一九三八年以后的部分,输入更多“活的史料”。如,国民党当局如何迫害韬奋,查封生活书店;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在周恩来的精心筹划下,地下党如何保护韬奋,避开国民党的通缉,隐居广东梅县江头村,以后又到了苏中根据地等。(为阅读方便,我在条目前加一个圈,注明全集未收,以示重点区别。)

韬奋去苏中根据地和最后病重的日子,他自己写的自传体著作《经历》、《抗战以来》、《患难余生记》原文已佚,唯一可寻觅可依据的是散见各处的回忆文章。经过资料集中、整理、编辑,由星星点点,逐渐有了一个大体的面貌。很多老同志,包括我自己,正是通过这项工作,相对比较清晰完整

地了解了韬奋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。

年谱编到后期,资料库里的材料用得差不多了。真的可以做扫尾工作了吗?我搜索记忆,还有两个心结埋藏在心头多年,牵挂着没有解开,必须作最后的追踪。

黄炎培先生是韬奋的前辈,是韬奋踏上社会,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,正式从事编辑工作的重要提携者之一。能反映两人交往的可靠资料是《黄炎培日记》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出版过一本《〈黄炎培日记〉摘录》,从一九三七年摘至一九四九年,作为内部参考出版。我认真阅读,对与韬奋有关的条目作了标记。当时心里盘算:韬奋与黄炎培相识于一九二二年,以后围绕《生活》周刊、《教育与职业》、生活书店、国民参政会、民主党派等,很多活动是共同进行的。他们的友谊从上海一直延续到重庆,日记里肯定会有记载,只是选用的角度不同,这本“摘录”不可能包容我所需的内容。从哪里可以读到全本的《黄炎培日记》呢?当时忙于手头的编写工作,心里打了个结:放到最后罢。到后期,有了空余时间,追踪“日记”成了首要任务。我有机会就打听,慢慢地知道黄炎培有几个子女在北京。我在上海,我的二嫂朱中英在北京,是个活跃分子。托她帮我打听,很快打听到黄的儿子黄大能和他家里的电话。准确的信息由此而来。整套日记不在他那里,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。我仿佛看到标的,开始有目的地瞄准。研究所最初的回音使我有点失望。他们的理由是所里有规定,这套日记连所里同仁都不借,所外就更不出借了。怎么办?放弃吗?既确认“日记”里必定有记录,就不能轻易就此放弃。我详细申述情况,并且保证摘录限定在规定范围内,一定经所领导审阅同意后再发表。对方静静地在倾听。他的耐心给了我希望。果然,“不出借”变成“研究请示后听回话”。多好的兆头!不久传来了“同意摘录”的答复,同时规定只能由我本人在所图书馆借阅。这已经是很大的支持了,其他规则都能遵守。我的心情,像听抒情小提琴曲似的,快乐无穷。

2004年10月13日,我和二嫂朱中英踏进研究所图书馆。这是一次极愉快的合作。管理员茹静年轻,热情,执行制度严格,有借有还,每天我们准时到研究所,她已经把要借的“日记”提前放在桌上了,给了我们好心情。“日记”如线装书包装,一本本,蓝布封套,虽从书库里取出,却很少灰尘。我专事阅读,二嫂专事摘抄。三个人各司其职,配合却十分默契。短短八个工作日,除旧时摘抄的近四十条,这次新核对和摘抄的近百条,可谓解开了

一个久悬的心结。《黄炎培日记》丰富了“年谱”的内容,帮助我们了解了他与韬奋交往的鲜为人知的新材料。

真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。首先,是“同意摘录”,继而,当我们把全部资料请茹静转交所领导审读时,心里还在忐忑不安,不知道能不能通过,不知道在北京要等多少天。意外地惊喜!第二天上午就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。我满载而归。每看到“年谱”里《黄炎培日记》的条目,就会想到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。

在资料库里滤出一本手工制作的图书。它引出一段动心的往事。

1995年年初,一天,一位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同行,重庆出版社的唐慎翔女士来到我面前。我有怪癖,历来羞于见陌生人,对她却是例外。少年时代在重庆念小学,我的四川话讲得也很“溜”,听她说话,像听到乡音,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她的距离。她讲了很多向生活书店老同志约稿的情况,重庆出版界的信息,问了很多我的情况。十多年过去了,至今还记得临别时她那火一样的话语:“嘉骊,你身体不好,编韬奋先生的年谱当然好,但是工程太大了,我愿意帮你,四川重庆那边我帮你找,好不,莫客气嘛!”初次见面就托人家办事多不好。我迟疑着。在她一再鼓动下,我出了一个艰难的题目:四十年代,生活书店在重庆出过一本读者信箱集,书名叫《激流中的水花》。就知道一个书名,其他情况一概不清楚。年代久远,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,又是在地域偏僻的西南角上出版的,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把中国的版图分割成块块,图书的流通自然也极度不畅。寻找当年的资料,在上海很难收效,只有到原发地去,成功的概率会大一点。事隔不久,2月27日,收到唐慎翔寄来的韬奋为《激流中的水花》写的“弁言”,多么难得,多么珍贵,赶在“全集”出版前收入全集第9卷。5月,唐慎翔又寄给我一本“书”。这是一本经过精心手工制作的“书”。复印的封面、内封、版权页、弁言、目次,按常规依次贴到位,正文书心却是32开大小一色空白。这本“书”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信息:《激流中的水花》是全民抗战社编,《全民抗战》信箱外集,1940年4月重庆生活书店出版,发行人徐伯昕,编著者全民抗战社,收入53篇与读者来往的信件,唯一的遗憾是正文没有复印。再收到唐慎翔的信,得知她患了恶疾,治疗后住到深圳她儿子家休养去了。结果令人伤感,她带着遗憾走了。当我重新拿起这本“书”的时候,想起唐慎翔这位可亲可敬的同行,她是开路先锋,是垫基石。为了“年谱”,也为了实现唐慎翔的遗愿,我都要追踪《激流中的水花》的正文。于是,又开始了一场不懈的追踪。

我目标明确,联系重庆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。联系的过程虽长了些,终于得到对方的全力支持,寄来了复印的正文。

值得大大书写的是,当读完这 53 篇正文后,心跳加快,我的直感,这是韬奋的手笔,是被遗忘了六十多年的一组佚文。多么大的收获!我像听到了一组雄浑高昂的交响乐曲,兴奋不已。随即,冥冥中似乎有人在提醒我,不要冲动,不要冲动,要冷静,要冷静,严肃的事切忌武断。

我找了一位熟悉韬奋著作的老编审汪习麟同志。他参加过《韬奋全集》的编审工作,负责任,细致,严谨。他的读后感和我不谋而合。他来信中肯定“这些回信出于韬奋先生之手”。他对复信中的“称谓”,语气,用词,到信末所署日期的习惯写法作了细致分析。

输入新发现的 53 篇佚文,就会想到唐慎翔,实现了她的遗愿;想到重庆图书馆,他们的全力支持,使“年谱”增加了“活的史料”含量,提高了书稿质量。为此,我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还有一件值得书写报告的事,关于韬奋遗嘱原始版的发现。这件事的详情我已有专文在 2004 年 7 月 20 日的《光明日报》和同年 9 月《出版史料》第 3 期刊载。可以认为这也是与“年谱”有关的一条“长篇注释”,为了方便阅读,我把它收编进集子了。

快乐的追踪接近尾声,再有拾遗补缺的工作,寄托给有志于研究韬奋的青年后代了。

编“年谱”的时候,我参阅了很多资料,也引用了不少,心里明白引用资料必须征得版权所有者同意。由于参阅资料太多,有的打过招呼,有的却没有。我编了一份参考书目,供查询。版权所有者可与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通讯联系。

今年 11 月 5 日,是韬奋诞辰一百一十周年,在这样的日子,我把这本“年谱”献给亲爱的父亲和他的读者们。这是女儿久藏于心头的一份愿望!

初稿 2005 年 5 月 31 日